



阳光书房

朱奎“大熊猫温任先生系列”

以哲学的智慧写就小孩的童话

□崔忻平



继30年前那个憨态可掬的“约克先生”之后，朱奎笔下的又一位“先生”诞生了。这一次，作家选取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动物形象——国宝熊猫。“大熊猫温任先生”系列共四册，从温任先生与温任太太生育自己的宝宝——黑黑白白的《大名鼎鼎的大熊猫温任先生》开启，将一位同样憨态可掬又彬彬有礼的温任先生形象送到了小读者面前。之后三部分分别为《记忆超强的大熊猫温任先生》《聪明绝顶的大熊猫温任先生》《无所不能的大熊猫温任先生》。朱奎的童话作品呈现出一种稀有的、极度放松的、归真的创作姿态。

作品中的温任先生与小熊维尼一样，举手投足，自具喜感。大熊猫温任先生认不出自己的家，因为出门前裁下的一根竹笋比离家时足足高出了33厘米。出于认真思考而屡屡出错的温任先生，似乎于现实生活中并不真实，但却无比真实地存在于孩子们的游戏之中。孩子们往往就是这样认真地、煞有介事地做着游戏，出着错。大熊猫温任先生的故事，如同为孩子们准备的一场契合他们年龄的纸媒游戏。

大熊猫温任先生浸润在一种无功利的、圆融自在的情绪状态下，又因孩子气的不疾不徐、煞有介事而显出呆萌的喜感。同时，朱奎作品以内在的智慧，于喜感之外，显出某种温文尔雅的哲学思索。

以童话作为切入哲学的轻巧之门，中国作家选择这样一条道路的并不多，多数是洋溢着爱与温暖的童话。以童话阐发哲学思索，似乎常常是由男性作家来开启的。陈诗哥的《童话之书》倾力于开启某种认识世界方式的哲思和对童话的再建构。但其思索力度极大，

须由有一定阅读积淀的读者才能从中寻到亲切感与共鸣。而朱奎则采取了一种化繁为简的童话哲学，是少儿读者也能透彻领会的童话哲学。之所以要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借约翰·泰曼·威廉斯博士的话来讲：“真相也许是智者所看不见的，但它却会透露给天真的儿童和初生之牛犊。”

朱奎的大熊猫温任先生系列，首先传递了人之初的善念——对待万事万物的尊重与信任。这种尊重与信任，有夫妻间的，也有自然与生物之间的。温任先生诚挚地向竹子致歉、向蜜蜂致歉，甚至向空气和水致歉，隐喻着物种之间、自然之间相互支撑方得以共存，又因相互体谅才得以久长。温任太太面对丈夫的决定，永远不急不躁，永远衷于赞叹：“亲爱的，你太聪明了！”这种温馨的、互信的、知足的家庭氛围，让人联想到安徒生那篇领悟多重的经典童话《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

作品中，新手爸爸妈妈迎来自己宝宝的情节，非常巧妙。一方面，朱奎先生有效利用了大熊猫的物种特点引起故事。刚落地的大熊猫宝宝与父母完全不像，肉粉色且体型小到不可思议的十几厘米。急切的父母以为自己的宝宝出了问题，便请来各种医生，啄木鸟、蝙蝠、金丝猴等也纷纷以自己的认知范围对小大熊猫做出了各异的，但对它们来讲都是非常负责任的判断，形象阐述了从自我出发认识他者，即所谓“以己度人”的局限性。为熊猫宝宝征集名字一章，更将这个哲学问题推向明朗。动物们纷纷从自己的角度帮小大熊猫起名。于是有了很睿智的一段：黑熊起的名是“熊崽子”，灰狼起的名是“狼老二”，兔子起名“不是三瓣嘴”，梅花鹿起

名“头上没有角”，大雁起名“不用南飞”……欢快戏谑，仿似一曲民间的“颠倒歌”。而细细思量，问题再次回归了本源，即从什么角度出发、用什么样的方式认识异己。

朱奎的童话虽然能被我们发现诸多闪光的哲学之思，但没有丝毫的艰深晦涩。他从容随意的讲述姿态，形成了一个各取所需、各得其乐、层次丰富、值得玩味的童话作品。朱奎自在地讲着他的故事，读者自然地进入自己适合的理解舒适区。如作品中对森林动物法庭的描写，在作家的调侃中，“规则”的面目瞬间全非，透出一种凌驾于规则之上的“私人规则”的虚伪可笑。荒谬的森林动物法庭，这是成人视角的判断。而换一个儿童的视角，我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朱奎其实不正是将孩子们“扮家家”时那种既要认真遵守游戏规则，又不断破坏游戏规则、再重新制订游戏规则的本真状态生动地描绘出来了吗？

朱奎的作品还有一个小细节非常打动我，即始终使用敬语。这当然像极了孩子“扮家家”时候努力模仿的“成人范儿”，但与此同时，这个细节弥补了以

民间故事起源的童话创作中常常被忽视的问题——礼仪问题。我们随处可见的童话作品中，小动物之间常常以“喂”相称，或者直接开口便说事。朱奎笔下的每一个出场的动物，每一次“会见”，都会恭敬地互问姓名，并恭敬地称为某某先生、某某女士或太太。这样一种尊重，实在是被我们这“礼仪之邦”经年淡忘掉的。其自觉携带的礼仪意识、尊重意识，与中华民族自古而来的“温良恭俭让”的民族美德遥相呼应。

国宝大熊猫，本应是中国童话作家最有书写优势的形象，但多年来，书写得显然还很不够，尤其是没有出现可以在孩子中代代相传的经典形象。中国当代的孩子，想到童话世界中的大熊猫形象时，常常脱口而出的是诞生于美国迪士尼的“功夫熊猫”。希望以后中国孩子再想到我们的国宝大熊猫时，蹦出来的，是这个“大名鼎鼎的”，“记忆超强的”、“聪明绝顶的”、“无所不能的”、彬彬有礼、温和敦厚的大熊猫温任先生。也衷心祝愿，朱奎以大智慧写就的大熊猫温任先生系列，成为中国童话通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短评

张之路以幻想文学而闻名，他的《霹雳贝贝》《第三军团》等作品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新作《金雨滴》也是一本幻想儿童小说，但是又有丰富的现实生活背景，在我们的生活逐步告别自行车而共享单车又开始大行其道的今天，读这本书，我感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小说的主人公老张有辆老旧的凤凰28自行车，对自行车有着深厚感情的老张，在家中为准备退休的自行车搞了一个隆重的告别仪式。没有想到，第二天自行车就在楼道里被人偷走了。为了寻找丢失的自行车，老张连续几天来到时光自行车招领中心，并且在这里分别遇到了少年春树、时光机械厂的工程师夏雨和收藏家秋愁，最后在车前子饭店见到了少年时代因为偷盗自行车被他告发的老同学杨学智和他的女儿冬梅。老张用小喇叭唤醒了学智的记忆，两个老同学相拥在一起。张之路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金雨滴》虽然是作者对一辆自行车的怀念，但其实也是在写一个人一生的悲欢离合、坎坷起伏。

这是一部关于感恩的作品。张之路说，他之所以把书名定为《金雨滴》，因为有一个让他刻骨铭心的真实故事。多年前他去一个学校讲座，老师领来一个步履蹒跚的孩子。他一边讲课一边好奇地打量这个孩子。讲座完了以后，他走到孩子身边问他有什么话想说。孩子说：有那么多人帮助过我，我却没有任何力量帮助别人。我希望天上能够下雨，下金雨滴，落在大家的身上，代表我的感谢，这就是我的愿望。金雨滴，代表着一颗感恩的心。虽然大家知道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但是人有了这样感恩的心，有了这种愿望，在我们的心里，在冥冥之中是可以实现的，这是我写小说的主要动力。”

这也是一部关于救赎的作品。书中杨学智的故事其实也有生活中的原型。张之路曾经当过物理老师，有一天校长突然找他到办公室。当时办公室里站着两个人，这两个人对之路说：“你们班的一个学生偷了我们大院的东西，现在找不到他。”校长让张之路带他们到这位学生的家里去，他“当时脑子里什么犹豫都没有，就带着他们两个到了学智的家”。当学智被他们从家中带出来的时候，他看着张之路叫了一声“张老师”。张之路说：“那一刻，我永远忘不了他的眼神，他对我是一种哀求、求助，因为他觉得只有张老师能帮他，可是就是张老师带他们来的，所以他的眼神一直就在我的心里，我就觉得这件事我做的既对，也不对。”他在后记中说，一个人要活得像一个人，要有尊严，也要给别人尊严。当你伤害了别人，你感到不愉快，或者陷入深深的自责，这个时候也许就是你人生最值得尊敬的时刻。

同时，《金雨滴》还是一部科学幻想小说和科学普及作品。小说把中国自行车的历史发展——从1870年北京第一辆自行车的出现，到各种型号的自行车的生产——通过博物馆的讲解员之口，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让孩子们在读故事的同时，可以了解中国自行车发展的演变过程。

——读张之路《金雨滴》

□朱永新

感恩与救赎的力作

《小老鼠又上灯台喽》,袁晓峰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动态

专家研讨殷健灵《访问童年》

12月8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殷健灵《访问童年》新书首发式暨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李敬泽，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尹志勇以及王泉根、李东华、刘颋、郭艳、刘琼、徐德霞、刘秀娟、陈香等与会研讨。长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黄嗣主持会议。

据悉，《访问童年》是殷健灵在深入调研、大量采访的基础上全新创作的一部作品。通过再现受访者对童年重要事件的回忆，阐释出童年的经历对一个人一生的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作品中受访者从1922年的老人到2005年的孩童，年龄跨度将近一个世纪，他们的童年小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100年的时代变迁，更蕴含着不同时代和地域里孩子们的心灵和感情，虽千差万别却异曲同工，虽幽微渺小却丰富而广袤。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故乡，找回初心，发现真实的自己。

高洪波表示，《访问童年》是一部有震撼力的作品。殷健灵兼具新闻界与儿童文学界的视角，再辅以女性作家细腻，成就了这部作品的感染力和穿透力。李敬泽认为，人不仅是生物性的存在，也是文化建构的结果，而现代人的文化建构很重要的一点则是对于童年的建构。《访问童年》这种直达人心的对话性文本，实则是对中国如何从童年一步步成长起来，进行了经验的分析、学理性的研究，它已超出了儿童文学，甚至超出了文学的意义，触及了广阔的社会文化心理。

会上，殷健灵感慨道：我是一个儿童文学的写作者，我始终关注的是人的童年，我认为童年是人性最深层的底色，感谢所有对我敞开心扉、敞开灵魂的受访者们，他们成就了《访问童年》，他们再次让我相信，只要一个人心中有光，世界就是暖的。

(欣 阅)

儿童文学的藏地书写与追求

12月21日，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主办的杨志军《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社长刘凯军，以及李建军、朱自强、李朝全、陈晖、刘颋、董宏猷、徐妍等围绕该作的艺术特色、思想价值等展开讨论。座谈会由纳杨主持。

《巴颜喀拉山的孩子》讲述在黄河的源头巴颜喀拉大草原，由于大气变暖、牲畜过度采食，草原面临退化，藏民们纷纷迁居城镇。小说以孩子的

视角，刻画了一群淳朴善良的藏区牧民，生动细腻地再现了藏区原始自然的生命样貌和社会形态，字里行间浸润着作者朴实的情感。

高洪波认为，《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将会是2013年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界特别重要且极具意义的一部作品。作品通过对藏族地区少年儿童生活的诗性书写，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命运遭际和思想情感，探视到了一种大时代中生活的嬗变，领略到了一种民族传统的承扬。

座谈会上，大家围绕作品的“藏

地书写”、“生态哲思”、“儿童视角”、“诗性语言”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与探讨。他们认为，这是一部内容丰富，主题深刻，极具艺术张力的儿童文学作品，在主题与创作格局上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品。作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精神世界出发，在展现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文化特色的同时，充满了对藏民和藏区生活样貌的深切理解、尊重与敬畏，表现了大时代的变迁、文明的消逝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以及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发人深思。(儿 文)

“维卡尼亚王国”幻想儿童文学征稿活动扬帆起航

为了更好地推动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发现更多的优秀儿童文学作者，保护并激发少年儿童的想象力，弘扬善良、宽容、诚信等优良品质，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和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了“维卡尼亚王国”幻想儿童文学征稿活动。近日，专家评委会成员王泉根、李学谦、卢勤、徐德霞、刘秀娟、陈香共同出席启动仪式，并就征稿办法、评审规则等进行深入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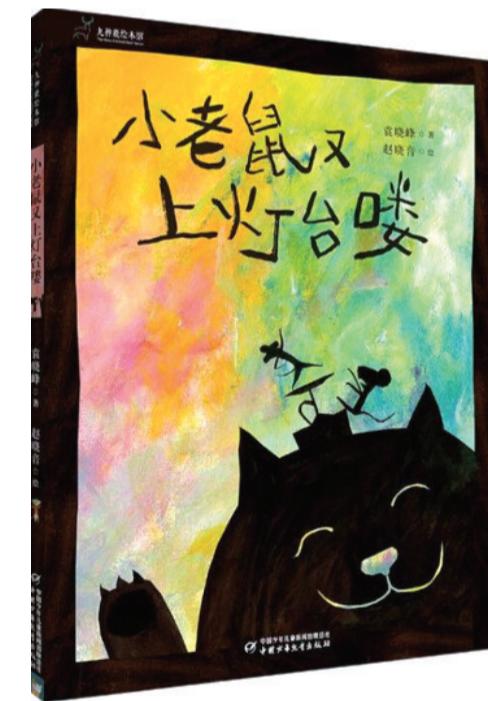
一部优秀的作品离不开精心设置的主题。活动主办方为参与者提供了四大可选主题——“爱”、“宽容”、“诚信”和“节制”，创作者可任意选择一位主人公、围绕其对应的主题进行创作。此次征稿期待从现实世界中的各种问题出发，探讨人与车、人与规则、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充满人文关怀的幻想故事，传递爱、宽容、诚信与节制等美德，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构建

理想、安全的未来。

据介绍，本次征稿活动为鼓励参与者开发潜能，积极创作，特设置特等奖一名，一等奖三名。获得特等奖及一等奖的作品将由中少总社出版发行。专家评审将秉持“拒绝平庸”的原则，不对投稿人作性别、年龄、地区和国籍的限制，力求选出真正具有文学魅力、艺术魅力和精神魅力的儿童文学原创精品。

(少 文)

■封面欣赏



儿童文学评论
·第453期·

韩乃寅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原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韩乃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11月28日在上海逝世，享年72岁。

韩乃寅，中共党员。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远离太阳的地方》《燃烧》《高天厚土》《城府》《岁月》《破天荒》《龙抬头》等。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张庆洲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铁路唐山工务段劳资科长张庆洲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11月22日逝世，享年66岁。

张庆洲，中共党员。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震城》《红轮椅》，中篇小说《草民》《折箩》，报告文学《唐山警世录》《青龙抗震奇迹考》等。

(上接第1版)

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诗歌是现代化的一部分。唐诗宋词再怎么辉煌，也是少数人的事业，甚至是富者的事业。而如今，写作和发表一首诗歌，成本为零。传播速度以分秒计，且分分钟遍及全国。有手机处便有诗。在小说、电影、戏剧、书法、旅游、购物等众多门类中，新诗真正成为平民的、大众的文化消费方式。诗歌是当今中国最便宜的精神消费。它可以爱，可以恨，可以兴观群怨，可以喜怒哀乐，不花一毛钱。新世纪以来，网络诗歌的流行，微信诗歌的火爆，都是新诗大众化的有力证据。快递员、厨师、菜农、画家、收银员、小业主都可以是诗人，都享有文化表达的权利和资源。人们拿新诗当话筒、福利、奖金、啤酒、可乐、煎饼、花卉、镇静剂安眠药……我诗故我在。诗生活。新诗真正大众化了。

但新诗不应仅仅如此。如果大众化是新诗可以达到的广度，那么精英化则是新诗应有的深度。新诗还需要承担语言创造的功能、文化更新的功能、思想探索的功能。发泄一下，大吼两声，或低吟，或浅诵，都未尝不可。但是，若能探测灵魂的更深处，把握时代更广阔的心理，表达我们民族最新的精神体验，不是更值得期待吗？新诗不可无限拔高自己，但也不可自我放逐，囿于个人小

天地而不自拔，诗的弹性是无限的，其大小取决于思想和心灵的半径。在诗的观念上，我热情拥抱大众化，这是五四先贤重要的精神遗产，在诗的思想上，我特别渴望新诗表达民族精神体验，体现民族文化精髓。

无论怎样，新诗都无法割断古诗的血脉。毕竟是中国文化的土地上长出来的。100年来，新诗决绝地反对传统，但这反对终究是揪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今天，新诗应当步入继承传统新境界的时候了。如果以古诗集大成的“诗圣”杜甫为例，对仗、平仄、格律反在其次。人与自然的深度融合，时代性的敏锐捕捉，社会景象的丰富摄入，对于当代生活的大胆呈现，语言的高度凝练，意象的生动，空间感的运用，炼字、句法、章法，种种诗歌的技巧，杜甫这些繁复的因素，都可能是新诗的营养品。然而，新诗这方面的成绩令人汗颜。新诗学习传统，并非让“死灰复燃”，也非“子曰诗云”，而是要推陈出新，为我所用。学习传统，最忌讳把已经固化的“传统”从地下挖出来，供上神坛。新诗不应做传统的搬运工。在我看来，杜甫于诗而言，既是诗法严谨的格律诗人，更是自由创造的先锋诗人，他的作品既是私人化的抒情，更是大众化的书写。而这自由和创造、个人和时代的辩证结合的传统，才是新诗要心领神会的。

东紫《好日子就要来了》新书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12月5日，由山东省作家协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城里的月亮——东紫《好日子就要来了》新书研讨会”在京举行。山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姬德君，作家、批评家白烨、胡平、贺绍俊、张清华、欧阳江河、张莉、陈东捷、岳雯、饶翔、刘大先、从治辰等围绕该作的艺术特色、现实意义等问题展开了充分解读。研讨会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主持。

姬德君表示，东紫是山东优秀的中青年作家，从2004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处女作至今已坚持写作14年，她的创作态度诚恳，作品少而精，《好日子就要来了》延续了东紫一贯的写作风格。在这部小说中，东紫以做假文凭为核心情节，将日常生活的真实性、讽刺性进行了文学的表达。

大家认为，《好日子就要来了》书写从乡村来到二、三线城市的女性群像，她们有不同的心理世界和生活遭遇，东紫将人物之间最尖锐、最强烈的矛盾做了很好的文学表达，可以称为“新世情小说”。故事主线涉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知识分子和文盲的矛盾、正直和堕落的矛盾等等，不露声色地反映了日常生活的悲剧性以及人的复杂性。有批评家指出，希望东紫有更大的文学抱负与写作匠心，将日常生活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中进行书写，或许会有更好的呈现。

“对于文学写作，我在摸索着往前走，”东紫坦言，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说，这样开诚布公的讨论和批评十分重要，“它让我更加清楚自身的长处和短板，这对于今后的写作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行 超)